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

Maritime Culture Studies of China

(第 4-5 合卷)



海洋出版社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

Maritime Culture Studies of China

第4-5合卷

曲金良 主编

海洋出版社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4、5合卷 / 曲金良 主编. -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04. 12
ISBN 7 - 5027 - 6286 - 8

I. 中… II. 曲… III. 海洋 - 文化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P7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2807 号

责任编辑: 刘义杰
责任印制: 严国晋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北京海洋印刷厂印刷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5.5

字数: 640 千字 印数: 1 ~ 1000 册

定价: 75.00 元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编委会
The Editorial Board

主任

Chair

管华诗

Guan Huashi

学术顾问

Advisors

杨国桢

Yang Guozhen

主编

Chief Editor

曲金良

Qu Jinliang

副主编

Vice-Chief Editors

赵成国 朱建君

Zhao Chengguo, Zhu Jianjun

卷首语

本书作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编辑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年刊的第4-5合卷，应该说是很迟到地摆在了读者面前。之所以说是很“迟到”，这里面有个中缘由，作为主编，我想需要在这里作一下说明。

自2002年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校长管华诗教授就提出，希望在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的基础上，联合全国有关海洋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筹建一个全国性的中国海洋文化学会，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促进全国海洋文化事业乃至全国整个文化事业的繁荣。这一美好的愿望和倡议得到了全国许多著名学者包括季羨林先生、王蒙先生、王晓秋先生、杨国桢先生等的支持，得到了海洋学界包括不少院士和高层人士的赞许，得到了全国相关学界和相关社会各界众多人士的一致响应。于是，中国海洋大学作为发起单位和依托、挂靠单位，将申报成立中国海洋文化学会作为全校重视的大事来抓，管华诗校长亲自挂帅成立了筹备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就设在海洋文化研究所，很快得到了国家教育部作为业务主管机关的批准，并转报国家民政部申请成立登记。于是，我们一面抓紧进行着学会的申报成立登记工作，一面抓紧筹备举办一次较大规模的全国性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海洋文化学会成立大会，准备一俟得到国家民政部的批复，学术研讨会暨学会成立大会即于2003年在青岛最好的季节召开。我们的这一计划安排得到了全国海洋文化相关学者们的热情响应和大力支持，并填写、汇寄来了拟作为会员筹备成立学会和参加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的相关表格，也汇寄来了各自的参会论文。但一方面由于2003年春天的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打乱了我们许许多多工作的安排，学会的申报成立登记工作不得已而搁浅，一方面尽管“非典”过后我们一再申报、一再等待，至今尚未得到批复。如此，一年过去了，我们只能先将各位学者的论文编选成集，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年刊的第4-5合卷交出版社出版发行。至于能否成立中国海洋文化学会，尚待民政部门的批复；关于举办海洋文化学会研讨会事宜，相信以后会不断有相关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活动。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将在学校的领导和支持下，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和参与下，与全国相关学术机构的同仁们一齐努力，共同推进海洋文化学术研究及相关学术活动的开展。

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关切，为准备召开的大会暨本论文集提交了高质量的大作。我们尤其感谢许多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他们不辞辛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撰写了足以使我们获益良多、引为楷模的论文。我们相信，中国海洋文化学术界有了这样一些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的引领和身体力行的研究著述，有了更多的中青年骨干学人的广泛探究和参与，这些学人中已有许多是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正在培养着一批又一

批相关专业热心海洋文化事业的博士和硕士人才，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海洋文化学作为一个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许多学科的庞大的综合交叉学科领域，以海洋世界观、海洋历史观、海洋社会观、海洋审美观、海洋发展观的当代构建为导向，一定会形成学人者众、成果者丰、道者高妙、儒者致用的生机勃勃、繁荣发展的学术局面。

再次感谢所有使我们心存感激的人们。

曲金良

2005年1月，于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目 次

卷首语	(1)
海洋文化的历史视角	王晓秋(1)
中国海洋史与海洋文化研究	杨国桢(6)
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的大陆文化影响	宋正海 张九辰(11)
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与东亚文明	李惠生(17)
哲学视野中的“海洋文明”	夏晓明(25)
海洋文化的哲学思考	李明春(32)
海洋文明的类型	郑敬高(37)
中国海岛海洋审美文化简论	柳和勇 叶云飞(44)
海洋文化研究的思维方法论探讨	张开城(51)
海洋世纪背景下的海洋文化与综合国力竞争	曲金良(57)
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光辉历史	辛元欧(63)
海洋文化的曙光——浙东稻作农业、石镬、巨石崇拜的传播与交融	林士民(69)
试论夏商时期的海洋文化	陈智勇(77)
徐福与哥伦布比较研究略探	曲玉维(84)
徐福东渡与日本弥生文化	张世响(88)
论福建在古代中国海上交通的地位	谢必震(97)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初探	陈 炎(108)
元代海外贸易概论	高荣盛(116)
郑和下西洋的文化成就	王佩云(126)
郑和之后明代航海业的发展与兴盛	朱建君(130)
一代海商的悲剧——兼论明代的海禁与“倭患”	方 牧(139)
姚莹海防思想初探	赵 红 安克骏(155)
海上丝绸之路与饮食文化传播	郑向敏 吴建华(161)
清代福建海商的构成及其经营形态	廖大珂(166)
从“官话”看近世琉球与中国人漂风难民	渡边美季(176)
中国海洋无形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马树华(182)
山东蓬莱贝丘遗址研究	袁晓春 朱 龙 隋凤美(192)

宋代妈祖褒封史实综考	刘福铸(198)
海神信仰与佛教、道教	王荣国(207)
海洋民俗的调查与研究	山 曼(212)
二界沟海洋渔业生产民俗调查——原始苯式橈张网生产作业情形描述	刘长青(215)
海洋考古学:西方兴起与学术东渐	吴春明 张 威(219)
历史上东南海洋生态环境与开发模式演进	王日根(233)
明清时期深圳发展与海洋关系探析	刘正刚(238)
闽南港市海洋人文发展的历史人类学思考	蓝达居(245)
海洋文化与海港城市文化——以上海海港新城文化发展为例	巫志南(253)
湛江都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	吴建华 郑向敏(261)
从湛江港的发展历史看 21 世纪中国海洋与世界发展	廖宗麟(266)
烟台城市形态空间演变及其海洋文化内涵	王 庆 李旭东 高光辰(269)
青岛市创建海洋文化特色现代文化名城的探索	马庚存(275)
海洋文化与山东海洋旅游开发	李 平(280)
浅论中国海洋旅游的市场定位与开发	柴寿升(286)
关于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	董志文(292)
海洋文化旅游和海南的发展	吴士存(297)
中国的海岛开发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山东省长岛为例	赵成国(302)
加快实施海洋大开发战略	刘子玉(311)
东亚海中大蛇怪兽传说的文化与地理成因	王 立(316)
东海神仙传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郑杰文(325)
唐前小说与东海神话传说	房 锐(331)
中国海洋文学的历史成就	王赛时(341)
英国作家的海洋情结	张德玉(352)
我国早期海洋科学研究与青岛水族馆的沿革	苏永生 徐鸿儒(361)
我国海洋仪器设备发展的历史	惠绍棠(369)
舟山“绿眉毛”船与郑和下西洋	郑 明 宋连琪 胡 牧 岑国和(378)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海洋政治——评《权力与相互依赖》中的海洋政治研究	刘中民(381)
日本强化海洋战略研究问题刍议	修 斌(393)

海洋文化的历史视角

王晓秋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海洋文化是一个新兴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它既包含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交叉、综合,又包含了基础理论学科与应用科学学科的交叉、综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发展潜力。这里,我主要想从历史学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想法。

我的祖籍是江苏海门,出生地是上海,长期学习工作的北京大学位于北京海淀,都与“海”字沾边。不过真正与海洋历史文化研究沾边则是在 27 年前的 1976 年。当时我带了北大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们开门办学,来到渤海边的军港旅顺,与海军合作编写一部《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我与参加编书的北大师生、海军官兵调查考察、研究中国万里海疆的海防、海战及海军建立发展的历史,最后写成 30 多万字的著作,1979 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先生去世前还亲自为该书题了书名。(当时流行集体编书,只写编写组不署作者名字)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电视系列片《河殇》引发的一场争论,又引起我对于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思考。这些年,我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国人如何认识世界与走向世界以及近代中外关系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过程中,也常常涉及从历史角度探讨海洋文化的许多问题,如中国人的海洋意识、海防观念、海权观念以及海上航行、海外游历等等。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常常试图用海洋文化的眼光去观察分析历史问题,如海洋意识、海上贸易、航海事业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等等。试图运用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视角和方法,有人把它称之为“海洋史观”。

无论是海洋文化的历史视角,或是历史研究的海洋史观,既涉及整个古今中外的历史,包含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也涉及历史学的各种专门史领域,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科技史、艺术史、文学史、民俗史等等。更细的当然还有海域史、海岛史、海防史、海军史、海战史、航海史、造船史、海关史、海产史等等。可见涵盖面很广,内容极其丰富。下面仅就平时思考的一些问题和事例,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和看法。

从整体世界历史和全球视野的角度来看,必须加强研究和探讨海洋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巨大影响。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的 71%,海洋面积为陆地面积的 2.4 倍,据说海洋立体空间更为地球表面空间体积的 300 多倍。因此有人开玩笑说人类居住的星球不应该叫“地球”,而应该叫“海球”。人类生命的起源与海洋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文明的形成以及世界各民族之间联系交往的加强,以至人类历史能成为一个整体世界的历史,并且日益走向

全球化,更是与人类认识、利用和开发海洋息息相关。过去西方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描述,大多强调地中海时代到大西洋时代,实际上是西欧中心论。而与西方地中海周边的希腊、罗马文明几乎同时,东方太平洋的中国、朝鲜、日本的东亚文明也相当发达,有人认为这是另一种东方型地中海(或称环黄海)。那么东方文明形成发展究竟与海洋的关系如何?当时东亚各国的海上交往路线、状况以及对东亚历史发展的影响如何?与欧洲地中海文明作比较有什么异同?另外,印度洋的古代文明也不能忽视,印度、波斯、阿拉伯、东非的文明形成发展与海洋有什么关系?印度洋如何成为东西方接触连接的渠道?还有东太平洋美洲一侧的古代印第安人的玛雅文明(墨西哥)、印加文明(秘鲁)也应重视。这些文明是否与远古亚洲人的海上迁徙有联系?中国古籍记载的“扶桑国”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另外西方学者大多强调公元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时代,尤其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作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国际体系的出现。其实这还是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有的学者提出当时在东方尤其东亚早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国际体系,包含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早期西方殖民者势力最初东来,并没有力量把东亚纳入西方国际体系,还只能希望加入东亚这个国际经济体系之中以获取利益。西方商人不得不远渡重洋,以美洲的白银来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水平领先于世界,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的盛举,也表现出远远高于欧洲的航海和造船水平。应该从海洋文化的角度重新探讨和叙述这一段世界历史。当然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东西方经济实力逐渐逆转,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西方列强依仗其强大的海军,进行海外殖民扩张掠夺,争夺海洋霸权,改变了世界面貌和国际关系格局。从海洋史观的角度,我们可以进行许多世界历史新课题的研究,并从中得到不少对我们今天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处理国际关系、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益的历史借鉴和启示。

从中国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18000多千米长的海岸线,6500多个岛屿和300多万平方千米的管辖海域(按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领海加上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而这片广阔的海洋国土却常常为国人所忽略或误解。甚至把中华文明简单归结为与海洋脱离以至对立的“黄土文明”,这是必须加以纠正的。回顾中国历史,大量史料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民族之一。从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独木舟的桨距今已有8000年的历史。山东大长山岛遗址发现6600多年前的船。文字记载中,《竹书纪年》有夏代的航海活动记录,“东狩于海,获大鱼”。甲骨文中也有殷商人扬帆出海的记载。《史记》写春秋战国时,吴国水军曾从海上进攻齐国,而齐景公曾游于海上,乐而不思归。《论语》中说连孔子也表示过想“乘桴浮于海”呢!秦始皇多次东巡山东沿海,命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和百工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而徐福船队出海东行后竟一去不复返。后人遂有徐福东渡日本的种种传说。以上这些都是发生在公元前的事例,难道能说我们的老祖宗不知道海洋吗?我们应该从考古遗址文物和上古史料文献研究中,发掘出更多中华民族先人从事有关海洋活动的事迹,并加以考订、阐述。

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曾经是海上贸易十分发达,航海和造船技术领先于世界水平的国家,这是值得炎黄子孙们自豪的历史。《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中国船队从广东徐闻或广西合浦出海,经东南亚、马六甲海峡直至印度马德拉斯沿海“黄支国”和“已程不国”(斯里兰卡),被后人称为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汉武帝时已与欧洲的“大秦国”(即东罗马帝国)有了交往。东晋僧人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到印度(当时称天竺),学梵文抄佛经。公元

411年,又从“狮子国”(斯里兰卡)坐船经印度洋和南海回国。唐代中国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海上交通十分发达,开辟了多条海外航线。如赴日本的东亚航线,还分为经朝鲜半岛沿海的北路,与直接横渡东海的南路。另有赴库页岛、勘察加的东北亚航线。特别是通往西方的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据唐朝宰相贾耽所著《广州通海夷道》记载,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越海南岛,沿印度支那半岛东岸航行,顺马来半岛南下。经苏门答腊、爪哇,出马六甲海峡,横渡孟加拉湾至狮子国,沿印度半岛西岸航行,过阿拉伯海,抵波斯湾。再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西航经巴林、阿曼、也门至红海海口,最后南下直至东非沿岸。唐代远洋海船把中国丝绸、瓷器、茶叶运销亚非各国,并收购象牙、珍珠、香料等物品,盛况空前。唐代重要海港广州、泉州、福州、明州(宁波)、扬州、登州等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港。而宋代的海上贸易更超过唐代,政府设立市舶司,给商人发放出海贸易的“公凭”(许可证),对进港商船征收关税,鼓励发展对外贸易。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宋朝书籍记载,通商的国家 and 地区就有50多个。包括阇婆(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大食(阿拉伯)、层拔(东非)等。尤其是宋代中国海船首先用指南针和罗盘针导航,开创航海技术的重大革命,后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才有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当时中国的海船建造水平及航海技术水平都达到了世界前列。宋代远洋航船依靠罗盘导航甚至可以横渡印度洋,直达红海和东非。元代航海事业又有进一步发展,元代的四桅远洋海船在印度洋一带居于航海船舶的首位,压倒阿拉伯商船。元代运用海船进行南粮北运的海上漕运。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见到中国港口有船舶15 000多艘。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更赞扬泉州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海港,甚至他在印度旅行还见到不少来自泉州的中国商船。元人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中记载与泉州港有海上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约近百个,泉州港口还建有指示航行的大灯塔。

明代初年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古代海洋及造船、航海事业的顶峰,也是世界航海史上极其伟大辉煌的一页。郑和船队规模之大,造船、航海水平之高,所到国家和地区之多,都可谓当时世界之最。郑和船队在1405—1433年的28年中先后七次远洋航行,到达东南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直至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所到之处进行和平外交与经济文化交流,谱写中外友好的篇章。他们开拓的航路、总结的航海经验、记录的见闻、绘制的海图都是留给后人的极其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最近由英国海军军官、“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提出了郑和首先环球航行并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新论点,郑和航海史更成为全世界学术界、新闻界关注与争论的热点。尽管孟席斯这个重写世界历史的论断还缺乏确凿的论据和论证,但毕竟提醒中国和世界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应该把郑和航海史作为中国海洋文化历史研究最重要最典型的课题作全方位、多角度、多学科的深入研究。例如郑和的海洋观、海权观、海防观、海洋外交思想、外贸思想、航海技术、海战战略战术、造船技术、航海路线、海图测绘、通讯导航、舰队组织、人才培养、海洋见闻、海洋文学、海洋民俗信仰,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动机、效果作用,所到之处的活动影响、遗址文物、民间传说等都应作具体细致的考察研究。不仅要搞清楚郑和船队究竟到了哪些地方?到底有没有绕过好望角到达西非和美洲?还要与当时欧洲的航海家如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的航行作具体实证的比较。更要科学总结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分析郑和航行为什么不能达到哥伦布航行的效果,没能推动中国航海事业更大的发展。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组织深入的学术研讨和各项纪念活动,充分总结继承发扬中华民族这一笔宝贵的海洋文化遗产。弘扬郑和和平开放、开拓创新、敬业献身的精神,增

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

郑和航海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辉煌和骄傲,但郑和以后中国航海事业的衰退和萎缩,又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和教训。应该认真研究和反思郑和以后明清时代政府的海洋政策和统治集团、知识分子以至民众的海洋意识。为什么明初鼎盛的航海事业会中断?为什么明清政府要实行海禁政策?其历史背景、直接动因以及更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原因是什么?禁海政策与日本倭寇海盗骚扰、郑成功反清斗争、西方殖民者入侵等等的关系如何?闭关锁国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其具体措施规定又是什么?其实我们也不要明把明清的海禁政策、闭关政策绝对化,似乎始终不许片板下海,一直紧闭所有国门。实际上,海禁在不同时期曾有松弛,民间商船仍不断东渡日本长崎进行信牌贸易。即使实行闭关之后,也并非完全封闭,仍留广州一地,允许各国商船前来贸易。但这种消极保守的外交及海洋政策,确实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和阻碍。尤其在18~19世纪,西方进行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突飞猛进之时,中国却不求进取甚至停止倒退,这一进一退形成东西方力量消长的悬殊变化,以至出现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这说明海洋意识与国家发展民族兴衰有多么重大的关系,这个历史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进入近代历史,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海洋更是息息相关。一方面西方列强加上日本侵略中国大多是从海上入侵。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无不如此。中国万里海疆,狼烟四起。帝国主义依仗船坚炮利,烧杀抢掠,横行霸道,迫使中国割地赔款,许多港口、海湾被割占、租借,海疆藩篱尽撤,有海无防。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关于海港、海湾、海岛、海域、海关、海运等等有关海洋权益的条款,看看我们究竟在近代丧失了多少海洋方面的主权和利益,以史为鉴。

近代中国军民曾经为反抗外国从海上入侵保卫祖国海疆进行过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过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等许多民族英雄。但历次对外战争却都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归根结蒂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愚昧、腐败和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综合国力的落后。中国统治者长期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各国都是蛮夷,应向“天朝”朝拜进贡。直到18世纪末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皇朝文献通考》对世界地理的描述,仍是“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1840年英国舰队已经打进国门,道光皇帝才急忙打听英国究竟在哪里?有多大?与中国有没有陆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连英国是大西洋中一岛国这样起码的地理知识都没有,可见对世界形势愚昧无知到什么地步!在鸦片战争刺激下,一批爱国开明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寻找救国道路和抵御外敌的方法。如林则徐编译《四洲志》,魏源编撰《海国图志》,徐继畲编著《瀛环志略》,梁廷枬写作《海国四说》等。这些著作达到了当时东亚对世界和海洋认识的最高水平,可是却不受统治集团重视,反被斥为“多事”。皇帝和权贵们依然迷信和议,苟且偷安。我研究过《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布,仅1854—1856年间翻印翻译的选本就有21种之多,对明治维新前夕日本人了解世界形势有很大帮助,被他们称为“天赐宝书”,“天下武夫必读之书”。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不禁令人感慨万分!

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缺乏海洋意识、危机意识和海防意识,不仅在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的两次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而且对新兴的日本从海上侵犯,也缺乏警惕和对策。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南部高山族地区,清政府竟视为“海外偏隅”,听之任之。最后签订《台事专

约》,反给日本50万两银子,以“息事宁人”。这种妥协退让态度助长了日本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海疆的野心。日本侵台事件后,经过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清政府官僚开始认识到东南海疆万里,已经门户洞开,再不加强海防和建立海军,前景“不堪设想”!于是分别建设北洋海军和福建水师。福建水师的军舰和人员都是由法国人做顾问的福州船政局制造和培训出来的。不料在1883年8月23日中法战争的马江海战中,几小时内就被法国舰队全部消灭。这真是对清政府依靠外国进行洋务运动和海军建设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值得好好研究,总结吸取历史教训。

甲午海战可以作为近代海军史、海战史以至海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典型事例。李鸿章花了中国人民大量血汗用了十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在1888年成军时确实是亚洲最强大的一支海军舰队,拥有两艘从德国买来的7000多吨的主力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1891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曾威震东瀛,吓得日本赶紧全力以赴拼命发展海军。而与此相反,清政府却满足现状,不仅不再添置战舰,反而压缩海军军费,甚至挪用海军经费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和三峡工程(北海、中海、南海)。一进一退,中日海军建设又拉开了差距。3年后中日甲午战争双方海军大决战时,便见分晓。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有着各种原因和国内国际因素,仅从海洋史观或海洋文化历史研究的角度,也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如清政府特别是李鸿章等权贵的海洋意识、海权观念、制海权观念、海洋国际法观念、海防指导思想、海军建设思想、海军战略战术思想、海陆协防思想,以及具体的海军组织、指挥体系、后勤供应、海防炮台、舰船性能、武器装备、海军人才教育、官兵素质、海战经过、战略战术得失、海上通讯情报、气象水文、海战新闻、海战文学诗词等许多方面内容。甲午海战和北洋海军留下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深刻总结认真反思的,失败和教训同样也是宝贵的历史遗产。

近代海洋文化历史研究还有一方面值得研究注意,就是近代中国人如何通过海洋走向世界。例如,出使、游历、贸易、留学、华工、移民等等。他们在海外的见闻、观感及其思想观念、心理的变化十分有趣,并留下大量著作、游记、日记、笔记、诗词。例如,1876年前往美国费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浙江海关委员李圭,原来不太相信地圆说,后来亲自从上海乘轮船出发一直向东航行,经太平洋到美洲,再经大西洋、印度洋,又回到中国上海。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地球真是圆的。同文馆学生出身一直做到出使大臣的张德彝8次出国,每次都写下一部以“航海述奇”为名的闻见录,自称要把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奇奇怪怪甚至骇人听闻的海外奇闻告诉国人。还如1887年出访日本、美洲的游历使傅云龙在其著述《游历图经余纪》中详细记载了自己横渡太平洋,特别是经过南美洲海峡,与惊涛骇浪搏斗的经历。凡此种种,都是海洋文化研究的极好素材。

可以说,海洋文化研究离不开历史研究,而历史学也应通过海洋文化研究扩大视野,开拓领域。海洋文化研究有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以上只是天马行空,兴之所至,谈点随想。相信有志于海洋文化研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们,在这块尚未开垦的园地里,只要辛勤耕耘,必将获得丰硕的成果。

中国海洋史与海洋文化研究

杨国桢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海洋史与海洋文化研究是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中国海洋史和海洋文化研究的学科建设,要在指导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研究顺序上,实现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的转换,对海洋历史和海洋文化现象进行理性的归纳,从而建立一种有别于陆地历史和陆地文化研究的程序和规则。

关键词 海洋史 海洋文化 学术程序、规则

Abstract The science of maritime history and the science of maritime culture are two basic maritim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o constructing the science of maritime history and the science of maritime culture, we should establish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inland view into the ocean view,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formations of study theories, study methods, etc.

Key words maritime history maritime culture study theories and methods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海洋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制海取海、缓解陆域压力、开拓国家的利益空间和安全空间,成为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一环。在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需求的驱动下,海洋科学和海洋技术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的新进展。但是,检讨我国海洋发展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在海洋经济和海洋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与之相配套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海洋发展的重视程度仍然远远落后于社会需要,不能及时提供理论指导和人文精神的支持。我在《海洋与中国丛书总序》(1998年)中作过这样的评说: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薄弱,植基于历史上重陆轻海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当代中国的海洋性研究虽在一些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但尚未出现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旅游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民族学、海洋文化学、海洋民俗学、海洋宗教学等的全面振兴,更没有形成多元综合的学术体系。所以,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国家教委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还没有一种人文社会学科的海洋性研究被列为二级学科的。

中国走向海洋,需要对中国海洋历史文化传统的自觉,了解它的源头、发展过程及其利弊,才能正确把握今后的发展趋向,进而取得适应新的历史挑战的自主地位。没有海洋历史文化传统的自觉,便没有当代海洋发展的行动自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为建设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科付出加倍艰辛的努力。

在建设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科中,海洋史和海洋文化研究既是基础,又是支柱。海洋史是海洋视野下一切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上说,包括海洋的自然生态变迁的历史、人类的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和海洋社会人文发展的历史。海洋文化是在海洋发展历史过程中所体现的人类群体和个体的海洋性实践活动的方式,它是历史地形成的,但却一直延伸到现实。“文化就是模式化地反复地出现在历史中的因素。”([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所以,海洋文化是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人类历史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要对海洋文化有深刻理解,首先是对其历史展开过程的认识及对其作为传统的文化的延续性和变异性的认识。所以,海洋社会人文发展史又是海洋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海洋史与海洋文化存在交叉、重叠、渗透的紧密联系,不能截然分开。

然而,学术研究说到底还是给所研究的对象制造一种程序、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同样是以海洋为研究的对象,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程序、规则。从学术实践上说,海洋史的研究重心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人文发展史,在本质上隶属于历史学;海洋文化的研究重心是人类因海洋而生成的文化现象,包括海洋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和海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应用研究,在本质上隶属于文化学。研究的程序、规则是有区别的,所以,两者又不能等同。海洋史和海洋文化研究相互交叠的领域——海洋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群体和个体在海洋性实践活动中的方式及其历时性的成果,既有历史学的程序和规则,也有文化学的程序和规则,与海洋史、海洋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海洋史和海洋文化研究并非崭新的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工作可以上溯到百年以前,为什么至今没有提升为二级学科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陆地强势文化体系的约束。中国历史学或文化学的研究模式、学术规范原本都是受陆地强势文化支配,以人类陆地活动为标准的。把海洋作为陆地的附庸,放在陆地社会分工的格局和学科架构去审视、归纳海洋发展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可避免地与实际产生偏差,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区域的特殊性被忽略不计。20世纪前期已取得极高成就的南海交通史地研究,本来有望推进为海洋史学的,最终却被整合到中外关系史学科之中。航海史等与海洋理工学科交叉或重合的部分,则被整合到理工学科门类下的科技史去。它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有关的海洋事象,也分别被整合在相关学科之内。这似乎没有排斥人文社会学科的海洋性研究,但向海洋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道路受到制度性的障碍。海洋历史文化的系统性被割断了,不符合上述学科程序、规则的研究课题被拒之门外,许多不能归类整合的海洋事象资料,长久无人问津,得不到流传,或者消逝得无影无踪。陆地文化霸权无所不在,甚至对海洋现象的描述和解说,也使用陆地化的思维定势和言语系统。直到今日,人们仍惯性地用陆地文化的言语表述海洋发展,如把海洋渔业称为蓝色农业,海水养殖称为海上种植、海洋放牧等等,而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这就使海洋发展的文明成果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体系中被低估和忽视,长期滞留在地方或民间的层次,在主流社会、主流学术中长期缺席,而被边缘化了。因而有人干脆断言中国历史上只有黄土文化,没有海洋文化。即使在承认中国有海洋文化的学者中,大多难以摆脱这种传统思维定势,对海洋文化的概念、内容以至理论和方法也是各说各话,介入中国海洋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中,在旧模式中复写(transformation of Paradigm)的现象也十分普遍。20世纪后期的海洋文化讨论,只局限于沿海地方的文史工作者这一范围,而非历史学界或文化学界的热

点,由于理论准备和知识积累不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不多,不能对以陆地为标准的研究模式、学术规范造成冲击,推动学术研究的突破,海洋文化知识尚未从区域性的知识扩展为全国性的知识。

影响所及,海洋意识尚未培育升华为全民族的意识,忽视海洋的社会心理还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转。中国海洋文化还不能平等地与其他海洋大国的海洋文化对话。这与建设海洋大国、海洋强国的目标形成强烈的反差。要扭转这一尴尬局面,加强中国海洋史和海洋文化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势必提上日程。

我是从历史学的立场和视角关注和思考中国海洋史和海洋文化研究的,在《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中,我曾提倡从如下研究方向去挖掘历史积累的海洋人文社会资源:

1. 海岸带开发史研究。包括临海地理、港湾、洋流、潮汐、风候的认识和利用,当地的农业与非农业开发,港口、港市的盛衰,等等。

2. 岛屿带开发史研究。包括岛屿的发现和利用,农业与非农业开发,等等。

3. 海洋国土开发史研究。包括海洋捕捞、海水制盐、海洋交通、海洋气象、海底资源的了解和利用。

4. 海洋贸易史研究。包括近海贸易与远洋贸易,国内贸易与海外贸易,海洋经济圈相关国家或区域的贸易互动,商品流通与管理,等等。

5. 海洋移民史研究。包括中国境内的海路移民与海外移民,海外移民回归或反馈,等等。

6. 海洋社会组织变迁史研究。包括渔村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移民社会及海洋活动产生的各种血缘、地缘、业缘、神缘组织,海防、海军、港务、海关等政府管理组织,等等。

7. 海洋社区发展史研究。包括沿海地区、岛屿等面向海洋发展的陆地社会经济变迁,“外向型”经济的成长,乡村的城市化,等等。

8. 海洋科技史研究。包括渔具、渔法、造船与航海技术、海洋自然灾害防治、海水和海底资源开发技术的演进,等等。

9. 海洋政策演变史研究。包括国家和地方性的海洋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或废止及对海洋社会经济的影响,等等。

10. 海洋思想文化史研究。包括海洋意识、海权观念、移民思想、海洋性风俗信仰、海外知识,等等。

在《海洋人文类型: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视野》(《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中,我又进一步提出:21世纪的中国史学需要重新“发现”自己的海洋史,从而对研究模式、研究方向、思维方式作出调整。

中国海洋人文的研究,逐步摆脱陆地化的藩篱,发展成回归海洋本质,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和体系,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和学术规范。

中国海洋人文的研究,逐步从专门史的研究发展为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共同研究和综合研究,从中国海洋扩展到世界海洋的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打开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历史研究的新天地,在世界海洋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为此,我们集合厦门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的学术资源和力量,依托现有的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门史国家重点学科、国家文科基础学科(历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组织师生共同探讨。“九五”期间的部分成果,即《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

《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村社会》、《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行为》、《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喧闹的海市——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陆岛网络——台湾海港的兴起》等8册,已组合成《海洋与中国丛书》,1998—1999年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接着,又规划“十五”期间进行《海洋中国与世界研究计划》,经批准列入厦门大学“211工程”第二期建设项目,内容包括东南海洋区域、海上山东、环渤海湾等海洋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经济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海疆政策、海洋管理、海洋灾害、海洋走私与反走私的研究,环中国考古沉船、海神信仰的研究,西洋航路移民、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的研究,东南亚国家和南海主权纷争的研究。其成果将组成《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12册),在2005年出齐。首批4册,即《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已交江西高校出版社,年内可以面世。这项研究计划追求的目标是:以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的互动为研究平台,进一步深化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破除忽视海洋发展的观念、心态和认识的盲点,用翔实的历史人文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论证海洋是沟通中外的大通道,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海洋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的国家利益,海洋国土是历代先人开拓经营的结果,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海洋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和传统的学科结构,实现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渗透和融合,推动海洋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分析中国海洋发展与海洋世界互动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要在指导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研究顺序上,实现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的转换,把海洋视为一种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不仅是单纯的区域概念或产业概念,对海洋历史和海洋文化事象进行理性的归纳,从而建立一种程序,一种有别于陆地历史和陆地文化研究的范式。也就是说,我们寻找和追求的是源头创新。这当然无法速成急就,需要长期冷静的思考、论证、批评、检验和修正,才能最终完成,我们目前所做的只是一种试验,不同的课题有不同的视野,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不同的史料来源(官私文献、遗迹遗物以至口述资料),从不同层面参与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完成这套丛书之后仍将继续下去。事实上,一些新的课题已经酝酿启动了,还有一些正在规划之中。如果这一发起能够得到历史学界的接纳和支持,相信到2010年,具有自身特色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的中国海洋史学有望初步成型。

我欣喜地看到,以中国海洋大学为首的一批海洋高校,加大海洋文科发展的力度和强度,相继成立海洋文化研究所,迈上建构中国海洋文化学的征途,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取得初步成果和不少经验。他们的学术立场与视角和我们有所不同,学科建构的形式也有所不同。比如海洋史在海洋文化学框架下是被纳入海洋文化史研究范畴的。尽管海洋文化学究竟应该放在那个学科和专业去建设,目前还没有答案,也不是经过几次学术讨论可以解决的,但他们的努力是具有前瞻性的。聚集人才,按照新兴学科生长的规律去潜心研究,找出学科整合的突破点,前景是十分光明的。中国海洋文化学的最终形成,必将促进中国海洋史学的发展,中国海洋文化学与中国海洋史学面对相互交叠的共同课题——中国海洋文化史,一定能够通过学科间的对话、交流和融合,产生丰硕的成果。